



臧雷振 著

政治学研究方法： 议题前沿与发展前瞻

Political Methodology:
Introduction, Interpretation and Innovatio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臧雷振 著

政治学研究方法：

议题前沿与发展前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学研究方法：议题前沿与发展前瞻 / 藏雷振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

ISBN 978 - 7 - 5161 - 8250 - 5

I . ①政… II . ①藏… III . ①政治学 - 研究方法 -

文集 IV . ①D0 -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1677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许琳

责任校对 鲁明

责任印制 何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75

插 页 2

字 数 199 千字

定 价 51.8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给伯父臧海淳先生和伯母叶贞江女士

目 录

第一章 割裂 VS 融合：新世纪国外政治学研究方法争论、挑战与反思	(1)
一 导论	(1)
二 新世纪政治学研究方法运用新特征	(5)
三 21 世纪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争论及挑战	(11)
(一) 政治学研究方法分裂及定性研究者的反诘	(11)
(二) 政治学研究的外部挑战	(14)
四 政治学研究方法争论与挑战的新认知	(17)
(一) 定量研究的价值和不足	(17)
(二) 定性研究的价值和不足	(19)
(三) 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差异	(21)
(四) 不同研究方法对政治学的学科影响	(22)
五 割裂还是融合？政治学研究方法发展新趋势	(25)
(一) 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新发展	(26)
(二) 不同研究方法的融合	(27)
六 本章结语	(31)
第二章 比较政治学研究中选择性偏差问题及其识别	(34)
一 导论	(34)
二 什么是选择性偏差	(37)
(一) 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特征与选择性 偏差的关系	(37)
(二) 选择性偏差的界定及相关研究	(41)

三 选择性偏差产生环节及类型识别	(43)
(一) 研究内容的层次	(44)
(二) 资料来源和数据类型	(45)
(三) 选择性机制	(46)
(四) 其他选择性偏差发生环节及类型	(47)
四 选择性偏差探索与研究方法发展	(49)
(一) 澄清对选择性偏差的认知问题	(50)
(二) 深化对比较政治学案例研究方法的认知	(52)
(三) 促进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融合与学科研究的发展	(53)
五 本章结语	(54)

第三章 比较政治学研究选择性偏差规避探索	(57)
一 导论	(57)
二 不同研究方法演进与选择性偏差引入	(59)
三 不同研究方法与选择性偏差来源	(63)
(一) “由果溯因” 比较研究路径与选择性偏差	(64)
(二) “由因溯果” 研究路径与选择性偏差	(66)
四 基于研究方法视角的被动型选择性偏差规避	(70)
(一) 案例比较研究中的选择性偏差规避策略	(70)
(二) 因果关系探索与选择性偏差规避	(73)
五 基于研究设计的主动型选择性偏差规避	(76)
六 本章结语	(78)

第四章 政治学实验方法：内涵、需求和挑战	(80)
一 导论	(80)
二 什么是社会科学研究实验方法	(82)
(一) 中文语境的“实验” 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验”	(82)
(二) 作为研究方法的“实验”	(83)
(三) 实验方法分类	(86)
三 政治学研究中为什么需要实验研究方法	(90)

(一) 实验研究方法采用的兴起的背景与条件	(90)
(二) 政治学对实验方法的需求	(92)
(三) 政治学实验方法的优势	(95)
四 政治学实验方法实践与挑战	(96)
(一) 政治学实验研究方法的实践历程	(96)
(二) 政治学实验研究方法的挑战	(99)
五 本章结语	(102)
第五章 政治学实验方法应用：进展及研究议题分布	(105)
一 导论	(105)
二 政治学研究中实验方法的引入	(107)
(一) 政治学对实验方法的认知历程	(108)
(二) 实验方法的价值	(109)
三 实验方法的应用历程及影响	(110)
(一) 20世纪前半期的政治学实验方法应用萌芽	(112)
(二) 20世纪中后期实验政治学崭露头角及政治学行为 主义革命的促进	(112)
(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验政治学的迅速发展	(114)
(四) 实验方法在政治学中的影响	(114)
四 实验方法的研究议题聚焦	(115)
(一) 政治信息传播、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	(117)
(二) 政治规则、政治制度与公共服务	(118)
五 本章结语	(119)
第六章 政治学研究中的数据：不深刻的理解与困境消解	(122)
一 导论	(122)
二 数据采集的困境	(124)
三 数据公开和研究再验证	(126)
四 大数据时代与互联网数据	(128)
(一) 大数据的机遇及对传统数据研究困境的部分化解 ..	(128)

(二) 大数据亦有大问题	(130)
五 政治学科发展支撑：数据、模型，还是理论？	(132)
六 阶段性结论	(135)

第七章 政治社会学中的混合研究方法：兴起及审视	(136)
一 导论	(136)
二 混合研究方法的产生、界定与分类	(138)
(一) 混合研究方法发展的历史背景	(138)
(二) 混合研究方法的萌芽与界定	(140)
(三) 混合研究方法的类型	(141)
三 混合研究方法的价值	(142)
(一) 降低研究方法偏差 (method bias) 的负面影响	(144)
(二) 促进研究设计框架优化	(145)
四 混合研究方法的应用困境	(146)
五 简短结语	(148)

附录 1 中国研究何以被边缘化：基于比较政治学的分析视角 …	(150)
一 导论	(150)
二 寻找比较政治学教学大纲中的中国案例	(152)
三 中国学研究：建构理论的努力和被忽略的缘由	(155)
四 比较政治学：“民主棱镜” (Democratic Prism) 所带来的影响	(161)
五 结论	(163)

附录 2 定性研究方法与比较政治学	(165)
一 导论	(165)
二 理论建构	(167)
(一) 阐明新理论假设的方法	(168)
(二) 概念和研究的测度	(171)

(三) 案例总量与案例选取	(173)
三 理论验证	(176)
(一) 案例内分析	(176)
(二) 跨案例分析	(179)
四 结论	(183)
 附录 3 社会科学研究全球化：基于学术论文产出、协作和引用的定量分析（1980—2009 年）	
一 导论	(184)
二 全球化，核心—边缘模型及定量指标	(185)
三 研究方法	(186)
四 社会科学领域论文产出的全球化	(187)
(一) 新增社会科学期刊的地理分布	(188)
(二) 边缘地区	(190)
五 跨区域合作的增加	(191)
(一) 合作成果的增加	(192)
(二) 自主地区和依赖地区	(193)
(三) 社会科学文章引用的新格局	(194)
六 结论	(195)
索引	(199)
后记	(208)

第一章

割裂 VS 融合：新世纪国外政治学研究方法争论、挑战与反思

本章导读：在 21 世纪之初的政治学界，以美国为代表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改革运动，推动了对 20 世纪中后期研究方法发展演变的反思，并对研究内容和学科定位产生了相当影响。本章首先对美国政治学中研究方法使用失衡的表现、学者争论的焦点、改革运动的缘起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学内外挑战进行系统性回顾；而后以此对不同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内在价值和不足之处进行客观评述，并指出导致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论出现本领域领域知识再生困境、理论创新窘境与学科影响力下降等现象，还存在由于“方法论误导”带来的研究议题认知错位；最后，本章力图通过对 21 世纪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变革历程的反思回顾，为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繁荣提供借鉴。

一 导论

虽然“政治学”这一学科的历史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政治学是在 20 世纪产生的，始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从 1880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政治学在大学里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并拥有正式的研究机构；1903 年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的建立，以及 1906 年《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专业杂志的创刊，标志着政治学研究已独立于传统社会学和经济学研

究。自此之后的一百余年来，政治学在历史背景、研究主题、研究方法^①、理论框架和评价标准等方面均经历了发展与演变（见表1-1），特别是在20世纪中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科学化的背景之下，通过吸纳来自不同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完善并充实了自身基本理论框架，使其不但在发达国家获得了显著地位，而且推动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学科研究走向专业化和科学化。如源自西方学界的、诸多耳熟能详的专业术语、理论流派等研究要素，不但广泛用于对发达国家政治现象的分析、解释和验证，同样促进了处在不同情境下的发展中国家中的政治学理论融合、延展和演化。

① 政治学研究方法名目繁多，特别是由于中文语境并不对方法论（methodology），研究方法（method）和研究路径（approach）等概念过多区分，进而导致相关概念（如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等）的混淆使用。其实，根据不同研究方法名称的发展溯源可做如下区分：从哲学思想史来看，源于大卫·休谟对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一般将研究方法分为实证（positive）分析和规范（normative）分析。前者指通过归纳推理，回答“是什么”（What is?）的问题，分析问题具有客观性，得出的结论可通过经验事实进行验证，其分析工具既可以是定量，也可以是定性的；而规范分析则是在价值判断基础上，通过演绎推理论答“应该是什么”（What ought to be?）的问题，其分析工具以定性为主。从英国经验主义和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区分角度来看，研究方法可分为经验（empirical）分析和理论（theoretical）分析，前者通过对经验事实归纳实现理论知识生成和检验，其分析工具包括案例研究、统计学等；后者则从抽象前提出发进行逻辑演绎并推导出结论，分析工具主要有形式理论、数理模型。但无论是经验分析还是理论分析，都侧重对现实存在的描述，属于实证分析范畴。从理论知识的理解和生成角度来看，具体研究路径一般分为定量研究（量化研究）和定性研究（质化研究）。定量（Quantitative）研究在16世纪通过借鉴拉丁语 Quantitativus 和 Quantitas 而出现在英文之中，而定性（Qualitative）研究则在更晚取自拉丁语 Qualitas。前者具体的研究工具包括统计分析和数理模型，后者则包括文本分析、参与式观察和个案分析。在近年来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受经济学研究影响，还将研究路径进一步地细化为形式（formal）理论（指将理论要素转化为数学符号以增强理论的明确性，以及用数学探索直觉不能得出的理论内涵）、小样本（small-N）、密尔法（指密尔在《逻辑体系》（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中所倡导的寻求因果关系的逻辑方法，也被称作“密尔五法”，即求同法、求异法、求同求异并用法、剩余法和共变法，之后成为定性研究中小样本比较的基本方法）。当前随着研究方法之间的交互融合，不同研究方法、研究路径和研究工具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为行文方便，本章一般只将研究方法做定量和定性的区分。

表 1-1 美国政治学的发展与变迁

		政治学科体系建立 (1880—1920 年)	行为主义革命时期 (1921—1966 年)	后行为主义时期 (1967—1988 年)	第二次政治科学革命 (1989 年至今)
学科研究聚焦		政府和正式政治制度	政治体系，非正式制度，政治行为	国家理论，国家—社会关系，正式政治制度，政治行为	国家理论，国家社会关系，正式政治制度，政治行为
理论层次	元理论	无	结构功能主义	国家理论	理性选择，博弈论，制度主义
	中层理论	无	利益集团，政党，政治结构，官僚，军队，民主化与稳定	国家，革命，威权类型和民主化，民主崩溃和转型，法团主义	国家衰败，社会族群冲突，民主多样性，政党选举，公民态度、政治文化与参与，发展型国家
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小样本比较	案例研究，小样本比较，跨国统计分析	案例研究，小样本比较，跨国统计分析	案例研究，小样本比较，跨国统计分析，国内区域统计分析，形式理论
评估标准	理论优势	建立学科特定研究主题	试图以元理论化来吸纳和分析社会行动者	强调基于案例的理论阐述，侧重政治过程和政治变迁	强调对行动者行为、行为选择及制度分析
	实证优势	强调对研究对象观察的实证研究	强调比较分析，扩大实证研究范畴	进一步侧重比较分析和长时间段的历史分析	意识到内生因素影响，强调实证验证的严谨性
	理论缺陷	仅将正式制度分析作为理论生成和聚焦的路径	缺乏中层理论融合，视决策过程为黑箱，视政治为不同要素输出结果，过分强调结构功能	缺乏中层理论的融合	缺乏中层理论的融合
	实证缺陷	缺乏系统比较，缩减实证研究空间	缺乏对结构功能主义验证	无	缺乏对形式理论的验证
与其他学科学派理论的关系	拒绝融合的理论	欧洲宏大理论和历史哲学	历史学理论	简化主义，演化论，功能主义	区域研究理论
	坚持借鉴的学科	历史：欧洲历史学派和法学研究	美国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	社会学，历史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依附论	美国政治经济学
	学者的价值取向	“有限民主”共识，保守和温和的自由主义	存在自由价值观念共识	存在自由，保守和激进价值观冲突	民主的保守主义，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观念的传统

注：改编自 Gerardo L. Munck and Richard Snyder, *Passion, Craft, and Method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39—40。

方法指导着一个学科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从表 1-1 可见，由于政治学科的复杂性、研究内容的丰富性与理论流派的庞杂性，我们难以对此采用基于单一维度或简化的名词加以描述，但在其发展变迁史中，无论是研究目标和视野的设置、理论生成和概念的变化，还是评估标准和学者价值取向的差异等因素，均最终反映在方法论的演变上。特别是在当代政治学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方法变得更为多元且变革节奏更加频繁。但在任一学科中，研究方法变革必然面临各种挑战和风险，政治学研究方法亦然如此。这也导致尽管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呈现出强劲的引领势头，但丝毫无法掩盖对其的各种质疑，其中既有来自非西方国家政治学者的诘难，也有西方国家学者的自身反思，如在 20 世纪 70 年代行为主义（Behaviorism）研究方法兴起的初期，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沃林（Sheldon Wolin）在《以政治理论为业》（*Political Theory as A Vocation*）中，便忧心忡忡地总结了彼时研究方法选择上的偏好对美国政治学的影响，即政治理论研究的科学化取向，会造成“自满的政治态度、微不足道的研究内容、逐步衰落的教育”^① 等负面效应。

在 20 世纪中后期研究方法行为主义取向的相关争论之后，出现了诸如后行为主义（post-Behaviorism）等试图对不同研究方法使用者之间的歧见进行折中或调和的新兴概念，但这并未使争论的烈度降低，“有关政治理论方法论的争论一直存在，并在未来不会减弱”^②，这也构成本学科的独特特征。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各种研究方法之间对学科内部话语权或影响力的竞争，导致了争论进一步升级。如在一封发送于 2000 年 10 月 15 日的署名为“改革先进”的致美国政治学会会员的信中，写信者批评了美国政治理论研究方法领域的刻意定量化取向，及其所导致的学科研究范围与研究视野等方面的偏好。匿名信中指出：“当前政治理论研究存在过多强调方法新颖性的贡献，忽略对

^① Sheldon S. Wolin, “Political Theory as A Voca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3, No. 4, December 1969, pp. 1062–1082.

^② Arthur L. Kalleberg, “Concept Formation in Normative and Empirical Studi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3, No. 1, March 1969, pp. 26–39.

现实问题解决的考量，通过对经济学经验主义研究模仿而丧失政治学应该关注的本源。”不同学者对此信观点的评价，掀起了新一轮政治学研究方法争论的高潮，其争论之广、参与者之众、影响之深刻，前所未有的，因而也被冠为 21 世纪研究方法的“改革运动”。本章以美国为代表，通过对自 2000 年以来的政治学科发展现状、改革运动发生缘由与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的回顾，并深入评价不同研究方法的最新进展，在学科中的使用特征以及对研究议题的影响，进而为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繁荣提供他者实践的借鉴。

二 新世纪政治学研究方法运用新特征

整体来看，21 世纪以来美国政治学的主体格局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就学科发展而言，由于政治学研究内容繁杂，大多数美国大学并不单独设立政治学系或者政治学院，而是将其划分到人文学院之中，以推进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和竞争。同时，根据学科研究主题的差异，政治学依然被传统地细分为政治哲学、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美国政治和政治学研究方法等不同分支。

出现的新变化是，不同研究主题采用的方法出现了趋同态势。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对经济学等学科的方法借鉴，相关统计方法和数量模型对政治学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使得基于历史、文化和档案的传统研究方法逐渐边缘化，在政治学刊物中发表的成果，则更多地趋向于采用定量分析技术。当然这种趋同性的内部又存在着一些研究方法使用的不平衡之处，具体如下：

第一，通过对已发表学术成果的方法采用加以考察可知：在不同时期，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存在着不平衡；同时这种不平衡也存在于定量与其他数理研究方法之间。以《美国政治学评论》所刊文章为例，在从 1906 年到 1988 年间发表的 2529 篇论文中，有 619 篇（24.5%）采用了定量数据分析法。虽然这一总体比例表面上并不高，而当进一步地将其划分为不同阶段加以考察时，则可见：以 20 世纪

60年代的行为主义革命（Behavioral Revolution）为分界点，定量研究的应用在此之后显著增加，体现在其占年度文章发表的比例从之前的不足1/4跃升到50%以上。但此时的一个显著问题是：这类研究多纯粹地借鉴其他学科的定量分析方法，并没有贴近政治学研究特征而展现出方法论的学科独创性。随后以20世纪70年代作为新分界点，此时期定量研究的重要创新，是从之前学者对政府部门数据的大量采用，转变为对原创性数据的使用；但随着对行为主义的反思潮流，其占总体刊文的比例有所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相关研究的方法应用，逐渐从对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借鉴，转向与原创性方法的融合，由此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又达到了新的高峰。^①在今天看来，这种时期上的阶段性差异，体现出不同年龄段的学者对研究方法的认识差异，或者说，新生代学者群体对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更多，且更为娴熟。

此外，定量分析的不同方法在采用率方面也存在差异。虽然在21世纪以来的《美国政治学评论》投稿中，定量分析方法的使用比例一直保持在50%以上，相关数理分析方法和小样本分析方法的采用却一直保持较低的比例（见表1-2），而且近年来新兴的数理建模等方法采用也位于较低水平。

表1-2 美国政治学会会刊《美国政治学评论》

投稿中研究方法使用的分布 (%)

年份	数理建模	定量分析	数理建模与定量结合	小样本	概念阐述	定性（经验分析）	其他
2012—2013年	8	54	9	1	22	5	1
2011—2012年	9	53	12	<1	20	5	<1
2010—2011年	8	50	10	3	29	NA	<1
2009—2010年	11	49	12	1	26	NA	1
2008—2009年	12	49	13	2	23	NA	1
2007—2008年	14	49	8	2	25	NA	2

^① Gary King, "On Political Methodology", *Political Analysis*, Vol. 2, 1990, pp. 1-29.

续表

年份	数理建模	定量分析	数理建模与定量结合	小样本	概念阐述	定性(经验分析)	其他
2006—2007 年	11	55	4	2	24	NA	4
2005—2006 年	14	51	5	2	23	NA	4
2004—2005 年	13	52	6	1	27	NA	1
2003—2004 年	11	51	8	2	26	NA	2
2002—2003 年	9	50	10	5	25	NA	1
2001—2002 年	17	45	7	1	29	NA	2
2000—2001 年	13	48	7	2	30	NA	0

注：笔者根据历年《美国政治学评论》总编报告整理而成（注：统计数据反映刊物投稿分布，但各刊物文章发表的最终分布接近于此比例）。

第二，在政治学各分支学科、研究主题或领域中，研究方法的运用存在不平衡。比如，在美国政治研究中，定性方法的使用要低于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等分支学科，^①通过对以美国政治研究为主的《美国政治学学刊》(*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美国政治学评论》和《政治学研究》(*Political Studies*) 1989 年、1992 年、1995 年、1998 年、2001 年和 2004 年等年份发表的论文加以统计，可见：“总量只有不到 8% 是定性文章，其中《美国政治学评论》中定量文章则高达 90%，且 26% 的论文使用了数理演绎模型”。^②但在比较政治这一分支学科的研究中，通过对其三大代表性刊物《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与《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 在上述年份中所刊 319 篇论文的数据汇总，则可见：“63.3% 的文章是定性研究的，36.7% 文章是定量的，仅有 4.4% 的文章使用数理演绎模型。”^③这组对比数据表明，

^① Paul Pierson, “The Costs of Marginalization Qualitative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American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0, No. 2, December 2007, pp. 146 – 169.

^② James Mahoney, “Debating the State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0, No. 1, January 2007, pp. 32 – 38.

^③ Gerardo L. Munck and Richard Snyder, “Debating the Direction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0, No. 1, January 2007, pp. 5 – 31.

在以美国政治研究为主的刊物中，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高于其他分支学科，相对而言，其对定性研究方法的使用较少。

在不同的研究主题中，研究方法的使用同样存在差异。如在政治行为分析中，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高于政治制度、政治哲学分析等主题。以 2011 年《美国政治学刊》编辑报告的统计结果为例，偏好使用定量和数理模型的研究论文，主要集中在民意分析和投票行为研究领域，分别位列其年度投稿量的第一和第二。

第三，不同学者群体对研究方法的使用存在不平衡。如对四种主要的美国政治学英文期刊《美国政治学评论》、《美国政治学刊》、《政治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s*）和《政治科学与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从 2000 年到 2009 年的发文数据加以分析，可知：“使用定性方法的女性占 24.3%，男性则为 18.8%”，^① 男性学者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的概率明显高于女性学者。由于定量研究需要长期的数据积累、充分的经费支持、结构合理的学术团队和严格的学术训练，而女性在上述方面通常处于弱势，使其对定量研究方法的采用低于男性学者。当然，这也与女性退出政治学者群体的比例高于男性有关，“在职业生涯中期退出的女性比例是男性的 2—3 倍，2006 年美国政治学会全职教授只有 17% 是女性”。^② 且鉴于女性学者本身“在顶尖期刊发文比例就远远低于其在教授群体中的整体比例”，^③ 也许统计非顶尖期刊中女性对不同研究方法的使用会出现其他结果，但显然不在本章进一步讨论范围之列。

第四，对研究方法的要求，因政治学教育的地区和层次差异而存在不平衡。如在 2007 年，有学者比较了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

^① Heather K. Evans and A. Moulder, “Reflecting on a Decade of Women’s Publications in Four Top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 44, No. 4, October 2011, pp. 793 – 798.

^② Leanne Sedowski and Michael Brinall, “Data Snapshot: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in the Political Science Profession”,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40, No. 1 – 3, January 2007.

^③ Marijke Breuning and Kathryn Sanders, “Gender and Journal Authorship in Eight Prestigious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 40, No. 2, April 2007, p. 347.